



# 以“解剖麻雀”的方式研敌知敌

## ——锚定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砥砺前行⑤

■陈双平

“知彼知己，百战不殆。”始则瞄准主要威胁、战略对手和主要作战对象是思考研究一切军事问题的起点，也是归宿点。习主席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“全面加强练兵备战，提高人民军队打赢能力”，又指出“研究掌握信息化智能化战争特点规律，创新军事战略指导，发展人民战争战略战术。”这为我们研战谋战立起了根本遵循、明确了主攻方向。

当前，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，我国国家安全形势不确定性增大，反分裂斗争形势严峻复杂，周边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争端更加凸显，家门口生乱生战的可能性增大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和社会稳定任务艰巨繁重。如何防范高技术突袭、如何加快发展制敌胜敌的新力量新手段、如何体系构建管用托底的战法……只有找准研究的起点站位，廓清发力精进的领域，用好“解剖麻雀”的方法工具，才能找到解决这些问题的“金钥匙”。

“解剖麻雀”是我党我军倡导并实践的一种重要工作方法，就是通过深入研究具体典型，看清事物内部各要素之间的联系和规律。“麻雀虽小，五脏俱全”，这一方法体现了由点到面、由个别到一般、由特殊到普遍的认识原理，其

精髓在于解剖一只麻雀、破解一类问题、推动一项工作。正如习主席反复强调的，“要坚持问题导向，紧贴作战任务、作战对手、作战环境，深化作战问题研究，有针对性地做工作”。

用兵之要，必先察敌情；常胜之家，必先悉敌情。列宁说：“一支军队不准备掌握敌人已经拥有或可能拥有的一切斗争武器、一切斗争手段和方法，谁都会认为这是愚蠢的甚至是犯罪的。”1950年抗美援朝第一次战役之后，彭德怀在废弃的《麦克阿瑟》《麦克阿瑟的两栖登陆作战》两本书，“几乎每晚睡前都会翻阅”，研透了麦克阿瑟的狂妄自大并作出针对性部署，为夺取第二次战役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在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中，以军对埃及和叙利亚部署的“萨姆-6”防空导弹重视不够，沿用以往战法，导致损失惨重。而在9年后的贝卡谷地之战，以军6分钟就彻底摧毁叙利亚19个“萨姆-6”防空导弹阵地，这正是以军苦心研究“萨姆-6”导弹技术性能并针对性采取制敌之策的结果。一定意义上讲，战场对抗就是作战双方研敌知敌情况的比拼。未来信息化智能化战争中，多维打击强度、态势转化速度、战略影响深度等都将

大大超越既有认知，以“解剖麻雀”的方式研敌知敌，无疑具有更为重要的现实意义。

对手之强，既强在武器装备等显性“肌肉”上，也强在实战经验等隐性“经脉”中。“解剖麻雀”讲究的是“由表及里”，需要用“工笔画”把对手的像画具体，把藏在对手脑子里的“密封卷”搞明白。一方面，要突出研究重点，既重视从宏观、中观、微观不同层面进行研究，更强调结合练兵备战现实需要，扭住其作战思想、作战原则、战法打法、装备性能等具体问题展开攻关，以敌为鉴、反观以求，做到强中见弱、利中见害、虚中见实。另一方面，要追求研究深度，系统收集占有最新资料，结合任务对比、梳理、消化，掰开揉碎、抽丝剥茧，“事”中求“是”，提高研究的针对性、有效性。比如，跟踪对手无人智能装备发展，应循照“作战理论—作战体系—装备发展—实战运用—启示借鉴”的逻辑链路逐层剖析；分析其作战行动，应重点梳理联合目标定位、多域隐蔽渗透、快速舆论造势等情况，从情报支撑、指挥控制、力量运用、装备变革等不同方面研提对策，等等。

敌人好比一面镜子，以敌为镜可以

知不足；敌人如同一位老师，以敌为师可以多胜算；敌人犹如一块砾石，与敌过招可以强素质。以“解剖麻雀”的方式研敌知敌，目的在于为戎军事斗争、练兵备战和改革建设提供有价值的路径参考，必须摒弃“书斋模式”，注重成果落地应用，否则就会偏离本质，流于形式。要科学比对、正确认识，实事求是分析对手优劣长短，确保成果可循可鉴；要研用结合、持续深化，采取理论研究、进入方案、实践验证、迭代升级等方法，检验完善研究成果，推动成果进入决策、融入实践、支撑预案；要共享成果、提高质效，用好信息化手段、搭建数据平台，实现各层级、各领域、各方向研究成果按需对接、定期推送。

“不知敌之情者，不仁之至也”，真正的军人，大脑时刻装着战争，眼睛始终瞄着对手。面对未来战争的严峻挑战，我们唯有不断强化研敌知敌的责任感、紧迫感，熟知其“昨天”、看清其“今天”、预判其“明天”，方能料敌在先、以变应变，肩负起新时代人民军队的使命任务，恪守做党和人民完全可以信赖的英雄军队。

(作者单位：陆军研究院某研究所)

## 八一时评

人究竟应该怎样活着、为谁而活着？对这一问题的不同回答，映射出一个人的思想境界，决定着一个人的人生走向。

“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”。雷锋，一名普通的战士，用22年短暂的生命历程，以平凡善举汇聚的温暖，为我们找到了答案。

翻阅《雷锋日记》，“人民”是一个高频出现的词汇。他说：“我觉得一个真正的革命者，他是大公无私的，所作所为，都是对人民有益的，他的责任是没有边界的……”“一个人，只要大公无私，处处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，兢兢业业为党工作，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，就是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”他常常告诫自己，“我要像柳树一样，插到哪里都能活，紧紧与人民连在一起，在人民中生根、长大、结果，做人民最忠实的勤务员。”这些脍炙人口的话语，洋溢着敬业、奉献、饱含着对党、祖国和人民的爱，呈现出撼动人心的精神力量。

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，战士每月的津贴只有6元钱。但在抚顺市望花区和平人民公社成立时，雷锋拿出自己平时节约下来的100元支援了他们；一位外地来的大嫂迷了路，他冒着大雨把大嫂送到家；逢年过节，他想到这个时候应当是各服务部门和运输部门最繁忙的时候，就主动到车站帮忙……他在连队是“业余修理员”、在医院是“劳动教养员”、在出差途中是“义务勤务员”、在部队驻地是附近小学“校外辅导员”。雷锋时时处处把人民的困难当作自己的困难，把党不利己、专门利人看作是最大的幸福和快乐，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。这是雷锋精神最深刻的内涵和最鲜明的特质。

精神所在，就是力量所在。宝贵的雷锋精神跨越时空、历久弥新。今天，雷锋种下的“精神之花”处处绽放，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新时代“雷锋”，把“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”的价值追求发扬光大。他们中有奋战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扶贫干部，有托举起乡村孩子梦想的支教老师，有见义勇为的时代楷模，有抗疫防疫中勇敢“逆行”的志愿者……勇立时代潮头的他们，把爱岗敬业放在心上，把为人民服务融入日常，把助人作为文明、用青春、汗水与热血讲述了一个个动听的中国故事，让雷锋精神在新时代、新征程上绽放出新的光芒。

在军队行列中，雷锋是军队的骄子，是人民军队的闪亮名片，是全军官兵学习的榜样；在精神高地上，雷锋精神是人民军队听党指挥、能打胜仗、作风优良的集中体现，与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一脉相承。进入新时代，

# 「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」

■夏孝栋

随着党和国家各项事业深入推进、蓬勃发展，人民军队学习弘扬雷锋精神的舞台更加广阔、实践更为丰富。像雷锋那样“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”，我们就要牢记我党我军的根本宗旨，把人民群众的需要作为第一需要，把人民群众的满意作为第一标准，把人民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、重于一切，做到哪里人民最需要就出现在哪里、哪里最艰险就战斗在哪里、哪里最危急就冲锋在哪里，使人民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、幸福感更可持续、安全感更有保障，用一个个“最美逆行”“最美冲锋”“最美背影”，书写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时代新篇，始终做和人民群众同呼吸、共命运、心连心的子弟兵。

(作者系长沙市社科联特约研究员)

## 找准教育的“频率”

■文/于磊 图/周洁

物理学上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：振动的音叉，靠近水面时就会激起层层涟漪；子弹打不穿、锤子锤不破的防弹玻璃，只要找准与之相一致的音叉频率，玻璃就会瞬间裂成碎片。这种现象被称为“音叉效应”，意指有的事物发生变化不在于对它作用力的大小，而在于能否把准脉搏，以期同频共振，用小变动带来大影响。

思想政治教育是围绕人做工作的，应该有直抵人心、引发共鸣之效。当前，思想政治教育仍存在一些不接地气、联系实际不够的现象。有的空谈没有道理，课虽然上完了，官兵的疑惑却没有减少；有的形式上“附加值”过多，原本的教育内容反倒成了“次要”；有的缺少说服力和针对性……诸如此类，就好比找错了教育的“频率”，难有感召力、穿透力，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，成效不佳。

习主席曾用“没有找准穴位，打鼓没有打到点子上”来形容思想政治教育“说不到官兵心坎里，激不起思想共鸣”的问题，强调指出“要取得实效，就要奔着现实问题和活思想去”。把准官兵思想脉搏，找准同频共振的教育“频率”，是解决思想问题、增强教育实效的“助推器”。

找准教育的“频率”，关键在于一个



准字。教育工作倘若忽视官兵的实际需求，就难以找到拨千斤的那个“四两”。领导和机关干部在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之前，要放下架子、深入基层、走进官兵，面对面沟通、心贴心交流，在“五同”中跟进掌握官兵思想动态，摸准弄清官兵所想所盼、所忧所需、所感所疑。教育过程中，要尊重官兵的思想基础和认知差别，防止“一刀切”“切忌一般粗”，区分对象，区分层次，把握教育的难点、重点和切入点，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。如此，教育方能未雨绸缪、有的放矢。

找准教育的“频率”，产生共鸣，前提在于发声。发出什么样的声音，怎样发出声音至关重要。习主席深刻指出，思想政治教育的力量在一个“真”字，要用真理说服人、用真情感染人、用真实打动人。坚持讲真理，是我党我军的政治优势，也是部队思想政治教育根本任务。坚持真理性，就是坚持讲好马克思主义，讲好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，特别是讲好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。官兵掌握了真理，就掌握了认识、分析和解决问题的方法，就能感悟真理伟力、受到灵魂洗礼，获得思想升华。

教育的“频率”找得准不准，“音叉

效应”发挥得好不好，领导干部和教育者的自身形象是关键。战争年代，我军思想政治教育之所以成效明显，就在于各级领导干部和教育者能够做到信仰坚定、恪守纪律、风清气正，从而赢得了官兵的尊重和信服。因此，教育者必须坚持言教与身教相统一，台上台下一个样，既要说得响亮，更要做得漂亮；既要口中无杂音、心中无疑惑，更要在实践中做得坚定坚决。这样行得端、坐得正，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，就能掌握好、运用好教育的“音叉效应”，形成“桃李不言，下自成蹊”的良好效果。

(作者单位：96886部队)

昏昏，使人昭昭”，心有杂念和偏见，那就不免“亲贵而不能而任，疏贱虽贤才而见道”；二是要看实效，“欲知治财之士，则视其仓库盈实，百姓富给，斯为善治财矣；欲知治兵之士，则视其战胜攻取，敌人畏服，斯为善治兵矣”。

毛泽东同志曾说：“必须善于识别干部。不但要看干部的一时一事，而且要看干部的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，这是识别干部的主要方法。”我们党向来注重客观、全面、历史地看待、选拔、任用干部，在更宽领域、更大范围把敢干事、愿做事、能干事的担当者大量选出来、大胆用起来，锻造了一支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。在新时代，我们应进一步完善日常考核、分类考核、近距离考核的知事识人体系，既把功夫下在平时，全方位、多渠道了解干部，又注重了解干部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、处理复杂问题、应对重大考验中的表现；既在小事上察德辨才，更在大事上看德识才，擦亮识才的慧眼、垒筑育才的基石、完善育才的制度，努力做到聚天下英才而用之。

(作者单位：解放军总医院第七医学中心政治工作部)

## 本事往往是逼出来的

■陈鲁民 吴峰



古往今来，有本事、成大事的人物灿若星河。他们或以伟业，或以学识，或以大道，名标青史，令人仰慕。然而，他们的本事不是天上掉下来的，也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，多半是逼出来的。

王阳明曾说：“天下事或激或逼而成者，居其半。”逼，有强迫、迫使之意，有督促、警醒之用，能起到置之死地而后生、背水一战之效。一个人在逼迫中，往往学着学着本事就到手了，才干就长进了，潜能就出来了。

本事往往是逼出来的，最重要的是自己逼自己。红军时期，20岁的“娃娃师长”李天佑，23岁的少共国际师师长吴高群，17岁的师政委萧华。他们都没上过军校，也无名师指点，肩负重担后，为了增长打仗的本事，就逼着自己向兵书学，向前辈学，向士兵学，向群众学，甚至向敌人学，从战争中学习战争，最终逼出一身能打打仗的好本事，指挥千军万马，锐不可当，屡立战功。

本事往往是逼出来的，还包括形势逼的。新中国成立伊始，急需向一些建交国家派遣大使，形势喜人又逼人，没有现成外交人才，就从一批身经百战的老红军里选拔，其中有伍修权、耿飚、黄镇、韩念龙等数十人。他们都是赫赫有名的战将，在战场上叱咤风云，对外交知之甚少。为适应形势之逼，他们从头学起，逼着自己学习吃西餐、穿西服、说外语，逼着自己外交礼仪，很短时间就“出师”了，后来都成了我国外交界的风云人物和重要领导。

本事往往是逼出来的，也包括他人逼之。1959年，苏联撕毁协议，撤走专家，并扬言没有他们帮助，中国永远造不出原子弹。他们这一逼，逼出了中国人自力更生的志气和决心，逼出了中国

人的智慧和创造精神，逼出了中国人的能时和本事。不到10年时间，我们就造出了原子弹、氢弹、核潜艇。后来，毛泽东同志幽默地说：为了感谢这一逼，“要奖励他一枚一吨重的奖章”。当前，一些国家对我们封锁、垄断，也都是逼着我们长本事。近年来，我们制造大型计算机、盾构机、航母、大型运输机等本事，也是这样逼出来的。

“不逼自己一把，就不知道自己有多优秀”，是时下流行的励志金句。还可以换句话说，“不逼自己一把，就不知道自己会学多少本事”。人的潜能是无限的，敢于逼自己一把，才会发现自己原来可以干很多事情，可以成就很多本领，可以成就很多梦想。马伟明坚持自主创新，带领团队以继日破解科技难题，取得重大成果；景海鹏勇于自我加压，战胜生理心理的极限考验，书写“三度飞天”的传奇……这些成就和本事的取得，都源于他们善于化压力为动力，自我超越、不懈奋斗。

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，全面建成世界一流军队，更需要一大批有本事的现代军人。指挥员要有运筹帷幄决胜千里之外的本事，战士们要有操枪弄刀杀敌立功的本事，后勤人员要有“给饷饷，不饱粮道”的本事，科研人员要有攻克“卡脖子”关键核心技术的本事……这些本事既是形势、任务、使命逼出来的，也是自己刻苦努力学出来的，千锤百炼出来的，精雕细刻磨出来的。

逼着自己长本事，肯定不是轻松愉快的事，需要坚定“衣带渐宽终不悔”的决心，历经“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”的磨练。对于新时代革命军人来说，这是一个工作标准，更是一种精神状态。新征程上，战友们不妨多一些自我加压，逼着自己奋起拼搏，逼着自己全力以赴，敢同先行者赛一赛，敢和排头兵比一比，不做台下鼓掌的看客，争做台上领奖的榜样，逼出一个不负青春年华的优秀自我，赢取强军征程上属于自己的那份精彩。

## 得人之道 首在识人

■傅凌艳

为政之要，首在得人；得人之道，首在识人。然而，识人之难历来是国家治理的一大难题。正如司马光所感叹：“知人之道，圣贤所难也。”

人才难得，轻视不得，耽误不得。我国古代既有周文王渭水访贤、周公吐哺礼贤、刘备三顾茅庐求贤、萧何月下追韩信的美谈，也有“冯唐易老，李广难封”的悲叹。冯梦龙在《新列国志》中写道：“历览往迹，总之得贤者胜，失贤者败；自强者兴，自怠者亡。胜败兴亡之分，不得不归咎于人事也。”由此可见，具备一双识人的慧眼是多么重要。

实践中，古人总结了不少识人之法。战国时期李悝有“居视其所亲，富视其所与，达视其所举，穷视其所不为，贫视其所不取”的“识人五法”；《吕氏春秋》提出“喜之以验其守，乐之以验其僻，怒之以验其节，惧之以验其志”的“识人六法”；诸葛亮则有“问之以是非而观其志，穷之以辞辩而观其变，咨

之以计谋而观其识，告之以难而观其勇，醉之以酒而观其性，临之以利而观其廉，期之以事而观其信”的“识人七法”。

阅人无数，不如阅人有术。识人是一种能力，一种智慧。清末重臣左宗棠曾讥讽曾国藩打仗远不及自己，有人反駁他，曾国藩带兵打仗或不如你，但识人用人远胜于你，你看曾国藩麾下的李鸿章、彭玉麟、胡林翼等均可抵挡一面，而你的楚军除了你以外还有哪个人可谓英雄？一席话，令左宗棠惭愧不已。

“治本在得人，得人在审举，审举在核真。”借助人才的名声与业绩考核的办法可以识别人才。然而，司马光指出过这种方法的弊端：“是故求之于毁誉，则爱憎爱进而善恶浑；考之于功状，则巧诈横生而真伪相冒。”意谓靠舆论的毁谤或赞誉，就会有个人的爱憎感情争相掺杂进来，使善良和邪恶混淆；而用功劳簿进行考核，就会巧诈横生，真假不明。对于不同范围的民意和不同

声音的评价，孟子则说：“左右皆曰贤，未可也；诸大夫皆曰贤，未可也；国人皆曰贤，然后察之；见贤焉，然后用之。”

听言不如观事，观事不如用之。一个人花言巧语，致力于言语的好听，一味地去取悦别人，就很少有仁德之心。正是因为有“巧言令色，鲜矣仁”这种现象，所以“君子不以言举人”。《傅子·通志》里讲：“听言必审其本，观事必校其实，观行必考其迹。参三者而详之，近少失矣。”在选拔人才的时候，把这三者综合起来参照考察，就会避免凭言语选人、用人的弊端。

“一流之人，能识一流之善。二流之人，能识二流之美。尽有诸流，则亦能兼达众材。”能不能识人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用人者。历史上，齐桓公之于管仲、秦穆公之于百里奚、秦孝公之于公孙鞅、刘备之于诸葛亮，皆因用人者本身即为贤明之人，胸怀大志而礼贤下士。司马光认为识人和考核之法，一是上级要“至公至明”，如果用用者“以其

## 玉渊潭